

# 大都市低龄老年人居住安排现状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王建平,叶锦涛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社会观念也发生巨大变化,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家庭结构去代际化明显。本文使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数据,对上海城镇地区 60~70 岁低龄老年人居住安排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上海低龄老年人以夫妻同住为主,与子女同住比例低,且远低于全国水平。研究还发现,现代化意识越高、个人经济能力越强的低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越低;拥有更好家庭住房条件的低龄老年人则与子女同住可能性更高;而健康状况和存活子女数等因素对于低龄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 大都市;居住安排;现代化意识;低龄老年人

**中图分类号:** C9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2019)05-0039-10

## 一、引言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迁,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截至 2016 年,我国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高达 2.31 亿,占总人口的 16.7%,已经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规模最大和老龄化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sup>[1]</sup>。在人口老龄化引起的众多问题中,养老是一个核心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和健全的背景下。作为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方面,其居住安排方式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传统社会中,受孝道文化和伦理的约束,与子女同住是老年人的主流居住方式。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我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内外不少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sup>[2][3][4]</sup>。已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仍然以与子女同住为主<sup>[4][5][6][7][8]</sup>,但是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夫妻单独居住<sup>[9]</sup>,而与子女同住比例正在不断下降<sup>[10][11]</sup>,尤其是在城市。老年人居住安排方式的变化将直接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代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迁。

上海市自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期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因而面对的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随着 1843 年开埠开始与国际接轨,上海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比较明显,人们在家庭观念层面比其他地区更加接近西方,传统家庭观念正在发生嬗变,代际关系逐渐淡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和去代际化日益显著,作为受外来文化影响深刻和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其老年人居住安排现状如何?是否与全国状况存在差异,都受哪些因素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本文将运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数据,对我国大都市地区的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获得在低生育率、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大背景下对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有更好的理解。

##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一)概念界定

世界卫生组织(WHO)基于世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人口预期寿命的差异,对老年人年龄的划分使用了两个标准:在发达国家将 65 岁以上人群定义为老年人,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将 60 岁以上人

**作者简介:** 王建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叶锦涛,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城市流动老年人口生存状态与社会支持研究”(19BRK033)

**收稿日期:** 2019-04-10

群称为老年人。目前,我国一般将60岁以上的人称为老年人,其中,年龄在60-69岁的老人为低龄老年人,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本文采用上述老年人年龄划分方法,将低龄老年人界定为60岁以上70岁以下的老年人群。

关于老年人居住安排,不同学者的划分标准不同,其具体内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般而言,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是指在老年家庭户中,老年人与亲属关系为主的共同居住者形成的居住类型及其构成,包括独居户、老年夫妇户、老少同住户和与成年亲属同住户四类<sup>[12]</sup>。也有学者根据研究数据,将老年人居住安排划分为以下四类:夫妻同住、单独居住、与成年子女居住和其他<sup>[13]</sup>。此外,还有学者将机构养老居住也划分进来<sup>[14]</sup>。基于此,本文从代际关系视角出发,将老年人居住安排界定为老年人是否与已婚子女同住。

## (二) 研究现状和研究假设

### 1. 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比例正在不断下降

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其结构必然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并且大量研究已经揭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内较早从社会学角度关注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生育制度》和《江村经济》。费孝通先生发现传统中国在生产和生活资源紧缺的社会环境中,出于理性考虑父母大多会选择与最小的儿子共同居住。

改革开放以后,原有居住格局受到明显影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比例正在不断下降。曾毅等人发现,进入21世纪初,虽然我国家庭结构三代户所占比例正在不断上升,两代户的核心家庭比例有所下降,但这不能说明中国家庭正在回归传统,只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滞后效应的结果,并且中国家庭正在向现代转型<sup>[12]</sup>。胡湛和彭希哲通过对1982-2010年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快速提升,家庭空巢化趋势日渐明显,老年人独立居住比重大幅度提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比例显著下降<sup>[15]</sup>。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客观上导致农村和小城镇地区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尽管有部分老年人会随着子女一起进入到大城市,形成所谓的随迁“老漂族”,但是有关研究发现这种比例并不高<sup>[16]</sup>。虽然城市是人口流入地,被迫空巢的老年人比农村少<sup>[17]</sup>,但城市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却低于农村地区。总而言之,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老年人与成年人子女同住比例明显下降,老年夫妇同居或者老年人独居所占比例正在不断上升<sup>[11]</sup>。此外,也有部分学者通过对包括普查数据和全国大型抽样跟踪调查数据等不同类型数据的分析发现,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群体正在快速增加,尽管与子女同住成为老年人比较倾向的居住方式<sup>[5][14][18]</sup>,但是老年家庭空巢化现象却越来越普遍<sup>[19][20]</sup>,并且比例正在不断上升<sup>[10]</sup>。以上研究表明,我国传统老年人居住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与子女同住的比重正在不断下降。

### 2. 老年人的现代化意识与居住安排

第一次工业革命拉开了欧美实现工业化及现代化的进程,受此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现代化理论。该理论在上世纪60年代后得到了迅速发展。一般而言,现代化有宏观和微观两个解释视角,其中微观角度侧重于个人,以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为代表,主张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微观层面基于现代化测量量表展开对“人的现代化”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高、在城市生活、在工厂上班的群体现代化意识更高,这些人往往具有接受新观念、尊重知识、重视教育、注重个体等特征<sup>[21]</sup>。英克尔斯认为随着社会及个体现代化意识不断提高,家庭关系尤其是代际关系会发生巨大变化。在整个社会现代化过程之中,年轻人会降低对于父母的依赖,但会强化他们与配偶之间的关系,即家庭不再以代际关系为主,而是以夫妻关系(或两性关系)为中心。在现代社会之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年轻人逐渐掌握更多技术,老年人不再是权威的代表,老年人权威逐渐解体,进而导致家庭权力转移,即老年人难以有效对子女的行为作出要求,例如老年人无法要求子女与其共同居住。西方家庭的老年人空巢比例非常之高,子女成年或者结婚之后往往会与父母分居,这也是西方社会之中核心家庭比重不断增高的原因之一<sup>[21][22]</sup>。

随着社会发展和观念的变迁,老年人也更加注重自我,不仅是年轻子女不愿意与父母同住,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意愿也在不断降低。加之,子女更倾向于自主选择工作和生活方式,相较于传统而

言,在现代社会中,子女与父辈家庭之间的离心力更强。另外,现代化的生活也使得人们时间分配更加零碎、角色冲突更加明显<sup>[23]</sup>,传统上的家庭成员在工作和生活层面联系比较紧密,而现代社会则完全相反。

19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最早提出了核心家庭的概念,并认为核心家庭是现代社会的主流家庭结构<sup>[24]</sup>。Murdock 则认为核心家庭是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其典型形态为只强调夫妻关系的夫妇家庭,代际关系被弱化。因此,在工业化社会中,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比例快速下降,并且家庭生育功能弱化,生育率逐渐降低<sup>[25][26][27][28]</sup>。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认为核心家庭是最适合工业社会的家庭,并提出了孤立的核心理念<sup>[22]</sup>。现代化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中的老年人居住安排不仅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且也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例如现代化意识等。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 老年人现代化意识越高,与子女同住可能性越低

### 3.老年人的养老期望与居住安排

现阶段,不少研究从养老视角出发探讨老年人居住安排和养老之间的关系<sup>[6][29][30][31]</sup>。部分研究<sup>[6]</sup>集中在老年人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鄢盛明等发现老年人居住安排在子女对父母的日常生活帮助、情感安慰和经济支出三个方面影响明显,居住距离越远,提供赡养的可能性越大,反之越小<sup>[6]</sup>。谢桂华进一步研究发现老年人居住安排和居住距离,不会影响子女所提供的经济支持,但却会影响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的支持<sup>[29]</sup>。还有部分研究关注代际关系对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sup>[30][31]</sup>。还有研究者指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使得父母积累了部分抚养费,从而减轻了子女的负担,相比较经济上的支持,老年人更看重的是子女亲情的安慰,在精神上感到不孤寂<sup>[32]</sup>。精神慰藉和亲情慰藉是老年人的养老期望之一,这种慰藉必须从家庭、子女中获得,与子女关系的好坏是亲情慰藉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与子女的关系则影响着老年人对子女养老的期待,子女越孝顺,老年人越愿意与子女同住。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 老年人与子女关系越差,同住可能性越低

近年来不少研究已经发现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对于其居住安排的影响<sup>[33][34][35][36]</sup>,即经济条件越好的老年人越不倾向于与子女同住<sup>[32]</sup>。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养老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老年人在经济上不再依靠儿女供养。在健康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老年人更倾向于独自居住,能使得生活更加自在。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3 老年人自身经济状况越好,与子女同住可能性越低

### 4.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居住安排

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自理状况是老年人选择是否与子女同住的一个限制条件。进入老年阶段,老年人的生活能力和自理能力逐渐下降,需要他人照顾,因此与子女共同居住更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已有研究发现,身体健康状况与老年人同子女居住意愿成反比。不少研究从个体感受出发,对老年人居住安排进行研究,例如不同居住安排格局下的老年人幸福感、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sup>[11][37][38]</sup>。张立龙发现,不同居住安排格局下老年人孤独感存在明显差异<sup>[37]</sup>。张淑芳进一步研究发现,城乡老年人居住安排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城镇老年人孤独感更强<sup>[38]</sup>。任强等通过对CFPS数据进一步研究发现,居住安排对老年人情感健康(抑郁程度)影响显著<sup>[11]</sup>。同时,已有研究发现居住安排对于老年人生活质量、认知功能<sup>[39]</sup>、精神健康<sup>[40]</sup>和心理健康<sup>[13]</sup>有显著影响。显而易见,已有研究已经发现不同居住方式下的老年人健康状况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部分研究指出居住安排对于老年人健康状况影响明显,另一部分研究发现老年人健康会影响其居住安排<sup>[1][36]</sup>。虽然60岁进入70岁阶段的老年人最容易出现与子女分居的情况<sup>[7]</sup>,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身体健康度不断下降和丧偶风险不断提高,个人生活照料需求不断增大,又会逐渐回归与子女同住。因此,本文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

假设4 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越好,与子女同住可能性越低

### 5.其他可获得性条件制约与老年人的居住安排

根据理性行动理论,人的社会行为除了受到主观意愿影响之外,还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是否与子



女同住的社会行为,除了自身主观意愿之外,还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即主观上想不想与子女共同居住,客观是否具有与子女同住或者不同住的条件。例如,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大城市地区,高昂的房价和昂贵的生活支出,导致不少城市老年人或者已婚青年迫于购房的压力而不得不与子女或者父母同住。因此,部分城市老年与子女同住并不是主观愿意与子女同住,而是迫于住房条件而不得不与子女同住。因此本文提出第五个假设:

假设5 老年人住房条件越好,与子女同住可能性越低

另外,在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因素层面,西方学者将影响老年人口居住安排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人口条件是否存在、经济上是否可行、意愿是否符合社会规范<sup>[4]</sup>。尤其是人口条件上是否可行,与子女同住前期是否有存活子女以及存活子女数量的多少。一般而言,存活子女数越多,无论是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还是情感交流上,老年人可依赖资源也越多,因此与子女同住可能性也越高。因此本文提出第六个假设:

假设6 存活子女数越多,与子女同住可能性越高

### (三) 研究述评

目前,学界对于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主要是从养老和老年人生活质量等视角进行探索。当然,由于老年人居住安排(方式)议题的特殊性,人口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分别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范式出发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人口学主要关注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健康、生活质量和老年家庭户的变迁等。社会学则基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社会关系(代际关系)和养老等理论视角关注居住安排,主要是从老年人居住安排与养老、老年人生活质量与居住安排,以及居住安排和老年人健康之间关系三个维度展开,实证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多。但是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不足和缺陷。

第一,研究视角过于单一。关于老年人居住安排,不少研究者将其作为自变量处理,也有不少研究者将其作为因变量。同时,不少研究者将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家庭关系、代际关系、老年人和子女经济状况等传统视角出发进行分析,却忽视了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快速现代化背景下,我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实,缺少从现代化视角出发、基于老年人现代化意识角度来关注老年人居住安排,即老年人现代化意识的不断提升是否会影响其居住安排格局。

第二,已有研究采用的数据是普查数据或者是采用全国性抽样数据例如 CGSS、CFPS、CHARLS、CLHLS 等,缺乏地区性和特大城市的大型抽样调查数据,尤其是北上广深等东部特大城市,极易忽视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差异性。中国的特大城市,一方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其老年人现代化意识更高,社会观念相较于其他地区更加开放,他们的居住安排是否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

基于以上两点不足,本文采用国内外单个城市调查研究中设计最复杂、样本最大的项目“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数据<sup>[41]</sup>,从老年人现代化意识角度出发对上海这类大都市老年人居住安排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

## 三、数据和变量

### (一) 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完成的一项大规模城市抽样调查“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简称SUNS)。该项目由上海市“高峰高原”计划社会学Ⅲ类高峰计划资助,由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s, CENDUS)负责设计和执行。该调查项目调查范围涵盖上海市所有区县,搜集包括社区、家庭、个人在内的多层次的追踪调查数据,包括居村调查和住户调查两个子项目。居村调查包括全市5732居(村)委会中随机抽取的538个社区,于2015年完成;住户调查则对全市具有代表性的180个社区进行入户访问,每个社区访问30户,对象包括所有同住家庭成员。最终的住户调查数据包括了5100多户家庭问卷,8600多份成人(15岁及以上)问卷以及1900份少儿问卷(包括1300多名在沪儿童和500多名留守儿童)。该调查项目为国内外单个城市调查研究中设计最复杂、样本最大的项目<sup>[41]</sup>。

为了更好地探究影响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影响因素,本文所采用的样本为该调查数据中 60 岁到 70 岁的上海户籍的低龄老年人。一方面,低龄老年人社会行动能力相较于中龄和高龄老年人更好,接纳新事物能力也更强,社会行为能力受身体因素影响相对较小;另一方面,研究中只包含上海户籍的老年人,可以排除那些因为工作、养老或家庭照料需求而产生的来沪务工“老漂族”和随迁“老漂族”<sup>[16]</sup>在居住安排上的独特性对于研究结果的干扰。

**(二)变量**

本文所采用的因变量为 60 岁到 70 岁的低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情况:1 为同住,0 为不同住。由表 1 可知,样本中不与子女同住老人为 624 人(59.32%),同住老人为 428 人(40.68%)。

解释变量包括现代化意识、住房条件、经济状况、存活子女数、健康状况和家庭关系等方面。

**现代化意识:**通过构建个人现代性量表来测量现代化意识。现代性测量量表包括 7 个题目,分别为:(1)我喜欢事前先做计划;(2)我不会询问朋友的收入,那是别人的私事;(3)如果朋友或亲戚没有事先打招呼就到我家来,我会觉得很不舒服;(4)丈夫应该更亲近妻子而不是其他家庭成员(如父母、兄弟姐妹等);(5)到外地旅游时,我首先考虑借住亲友家,其次才是住宾馆;(6)我喜欢学习新知识或新技能;(7)人们对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好事情。现代性量表测量包括公共性,对隐私、家庭的外延、新事物的看法等方面。每题答案有 4 个选项,每项分别赋值从 1 分到 4 分,分别为“很不符合”(1 分)、“不太符合”(2 分)、“符合”(3 分)和“非常符合”(4 分)。将量表中的 7 个问题得分加总。量表得分最低分为 7 分,最高分为 28 分,得分越高现代化意识越高,所有老年人平均得分为 18.3 分。根据样本得分平均值(18.3 分),我们将上海市老年人现代化意识得分平均值作为分割点,将得分划分为两个层次:高现代化意识(18.3 分及以上)和低现代化意识(18.3 分以下),其中 51.52%的老年人得分高于平均值,48.48%的老年人现代性得分低于平均值。

**住房条件:**住房条件可操作化为老年人家庭住房面积和是否拥有其他住房两个变量。由表 1 可知,上海市低龄老人家庭住房面积均值为 82.65m<sup>2</sup>,且有 29.18%的老年人拥有其他房产。

**经济状况:**用个人月收入来反映老人的经济状况。由表一可知,上海市低龄老人平均月收入为 3615 元,经济状况相对较好。

**存活子女数:**是指老人所有目前仍然在世的子女数目,也是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可获得性资源,从表一可知上海市低龄老年人人均存活子女数目为 1.21 个。

**健康状况:**身体健康变量操作化为日常生活能力(ADL)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DAL)两个指标。ADL 和 IADL 指标是根 IADL 和 ADL 量表加总而来,其中 ADL 量表 10 项<sup>①</sup>,IADL 量表 7 项<sup>②</sup>,每项分值从 1 分到 4 分,分别为表示“没有困难”(1 分)、“有困难但是能做”(2 分)、“做时需要帮助”(3 分)和“完全不能做”(4 分),得分越低身体越健康。ADL 平均得分为 11.7 分,IADL 平均得分为 7.49 分。

① 这 10 个题目分别为:跑一公里路、走一公里路、步行 200 米、在房间内走动、连续坐 2 小时、长时间坐着后起来、上一层楼梯、连续上几级楼梯或者台阶、举起或提 5 公斤重的东西和蹲、跪、屈膝。

② 这 7 个题目分别为:做饭、处理家务(例如洗衣服、打扫卫生等)、处理银钱/管理钱物、吃药、使用电话、购物和乘搭交通工具。

**家庭关系:**通过与同住子女和不同住子女之间关系来测量,子女关系好的老年人所占比重为 83.49%,关系不好的比重为 16.51%。

四、低龄老人居住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一) 居住安排现状

从表 2 可知,上海市老年人中仅有 34.96%的老年人仍然与子女同住,不同住的比例则超过 65%,而低龄老人不与子女同住比例(59.32%)稍低,这意味着在上海,三个低龄老年人中有两个不与子女同住,这也表明不与子女同住<sup>①</sup>已经成

表 2 上海市老年人和全国老年人居住安排现状

	不与子女不同住	与子女同住	合计
上海市老人(60 岁及以上)	65.04%	34.96%	100%
上海市低龄老人(60-70 岁)	59.32%	40.68%	100%
全国老年人(60 岁及以上)	31.77%	68.23%	100%

数据来源:SUNS 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为上海市老年人主要居住方式。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普查数据对标,发现与子女同住老年人所占比例为 68.23%,夫妻同住所占比例 15.37%,独居老人所占比重 16.4%。不少研究也表明<sup>[4][5][6][10]</sup>与子女同住仍然是中国社会老年人主要居住方式和选择,上海市老年人主流的居住方式与全国存在明显差异,其老年人不与子女同住的比例远高于全国水平。相较于上海所有老年人,上海市低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比例相对较高,所占比例为 40.68%。上海市低龄老人可能出于对孙辈群体的照顾和子辈群体的需求而选择与子女同住,但是随着孙辈群体的成长和子辈群体生活能力提高,独立性增强,他们开始与子女分居,造成老年人群体年龄越大与子女同住比例越低。

(二) 不同居住安排状况老人的特征

表 3 报告了不同居住安排状况老人的特征,在上海市低龄老年人中,不同住老年人的高现代化意识比例(55.4%)高于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46.5%);在与子女关系方面,不同住老年人群体与子女关系比同住老年人群体与子女关系要差。在经济状况方面,不与子女同住老年人的个人月收入(3704 元)略高于与子女同住老人的个人月收入(3487 元)。两类群体健康状况的两个指标(IADL 和 ADL)差异不大,身体健康状况都较好。同时,不与子女同住老年人拥有其他房产比重(26.1%)明显低于与子女同住老年人群体(31.0%),而不同住老年人群体的住房面积(80.55 m<sup>2</sup>)也比同住群体(88.19 m<sup>2</sup>)小。在存活子女数方面,不同住老年人群体平均存活子女数(1.22)高于同住老年人群体(1.19)。

表 3 不同居住安排状况老人的特征

	是否与子女同住	
	不同住	同住
现代化意识		
低	44.6%	53.5%
高	55.4%	46.5%
家庭关系		
好	79.2%	85.8%
不好	20.8%	14.2%
个人月收入	3704	3487
健康状况		
IADL	7.46	7.54
ADL	11.75	11.77
住房条件		
有无其它房产		
没有	73.9%	69.0%
有	26.1%	31.0%
住房面积	80.55	88.19
存活子女数	1.22	1.19
N	624	428

(三) 居住安排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表 3,我们发现在与子女同住的低龄老年人和不与子女同住的低龄老年人两个群体在一些研究变量上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为了进一步了解哪些因素对于老年人居住安排存在影响,我们以是否与子女同住作为因变量(1=与子女同住,0=不与子女同住)采取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低龄老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表 4 中,模型一是基准模型,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是控制变量。在模型二和模型六中,现代化意识对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始终显著,即老年人现代化意识越高,则与子女同住可能性越低,假设一得到有效验证。因此,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上海市,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比例(34.96%)远远低于全国水平(68.23%)能够得到有效解释。

① 也可以说老年人家庭空巢率较高,包括夫妻同住空巢和独居空巢。

表 4 低龄老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年龄	-0.0697 * * *	-0.0691 * * *	-0.0715 * * *	-0.0672 * *	-0.0682 * *	-0.0644 * *
	(0.0202)	(0.0202)	(0.0204)	(0.0205)	(0.0211)	(0.0217)
性别(0=男)						
女	-0.00140	-0.00885	-0.00492	-0.0205	-0.000780	-0.0334
	(0.0320)	(0.0323)	(0.0323)	(0.0337)	(0.0321)	(0.0342)
婚姻(未婚/离婚/丧偶=0)						
已婚	-0.00761	0.000181	-0.0809	-0.0778	-0.00649	-0.138
	(0.218)	(0.219)	(0.224)	(0.220)	(0.218)	(0.227)
教育(0=初中及以下)						
高中	-0.0653	-0.0171	-0.0894	0.0370	-0.0700	0.0506
	(0.149)	(0.150)	(0.150)	(0.155)	(0.150)	(0.159)
大专及以上	0.0167	0.0834	-0.0284	0.186	0.0101	0.209
	(0.175)	(0.177)	(0.176)	(0.198)	(0.177)	(0.203)
现代化意识(0=低)						
高		-0.345 * *				-0.311 *
		(0.129)				(0.131)
家庭关系(0=不好)						
好			-0.476 * *			-0.454 *
			(0.180)			(0.183)
个人月收入				-1.261 *		-1.353 *
健康状况						
IDAL				(0.525)		(0.540)
				0.0344		0.0288
				(0.0432)		(0.0438)
DAL				-0.00414		0.00962
				(0.0280)		(0.0290)
住房条件						
其他房产(0=无)				0.281 *		0.280 *
				(0.142)		(0.143)
住房面积				0.00276 *		0.0026 *
				(0.00135)		(0.00137)
存活子女数					-0.0370	-0.113
					(0.150)	(0.156)
Constant	4.157 * *	4.284 * *	4.451 * * *	3.986 * *	4.103 * *	4.223 * *
	(1.331)	(1.336)	(1.345)	(1.374)	(1.349)	(1.411)
-2LL	1409.5	1402	1390.5	1393.5	1409.5	1369
R <sup>2</sup>	0.0086	0.0136	0.0141	0.0198	0.0086	0.0294
样本量	1052	1052	1042	1052	1052	1052

注：“\* \* \*、\* \*、\*”分别表示在0.001、0.01和0.05水平下显著,括号中为标准差

在模型三中,与子女关系的好坏对上海市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影响显著:与子女关系越差,同住可能性越低。在模型六中控制住房、收入等影响因素后,与子女关系对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这种影响关系仍然显著,假设二得到证实。

根据理性行动理论,人的社会行为除了受到主观意愿影响之外,还受到客观实际条件的制约。是否与子女同住的社会行为,除了受自身主观意愿(即主观上是否愿意与子女同住)影响之外,还受到客观条件(即客观是否具有与子女同住的条件)的制约,如不与子女同住,在经济是否能够完全独立,是否拥有更好的住房条件以及身体健康状况是否允许等。在本文中所考虑的制约因素主要是身体健康状况、住房条件、经济状况和存活子女数等因素。

已有研究<sup>[1][36]</sup>表明,老年人的健康状态越差,与子女同住可能性越高。我们在模型四和模型六中加入经济状况变量、身体健康变量和住房状况变量,研究结果显示老人自身的经济状况对低龄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也非常显著,经济能力越强(月收入越高)的低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可能性越低,父代经济能力越强与子女同住可能性越低,假设三得到证实。此外,低龄老年人健康状况对于其居住安排没有显著影响,假设四没有得到证实。这可能是受到样本群体年龄的影响,因为低龄老年人相较于中龄或高龄老年人而言,身体健康状况相对较好,社会行动能力较强,受到健康因素制约较小。家庭是否拥有其他房产和住房面积大小对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影响显著,即拥有其他房产和拥有更大住房面积老年人



与子女同住可能性呈现正相关关系,假设五没有得到验证。由于上海市特殊的城市地位和地理区位,其房价极高,住房成为影响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客观因素,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的老人,可以通过与子女同住而带来住房条件的改善,从而使得模型结果呈现出家庭住房条件和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可能性正相关的现象。

我们在模型五和模型六中加入存活子女数这一变量,分析结果发现存活子女数对于老年人居住安排没有显著影响,假设六没有得到证实。存活子女数多少是老年人是否拥有与子女同住的可获得性资源,是否存活子女数越多,与子女同住可能性也越高?作为社会大众都关心的问题,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在上海低龄老年人中,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上海的低龄老年人经济状况普遍较好,城市养老功能齐全,再加上和谐的社区环境在满足老年人情感需求和提供日常照料等方面对子女这种可依赖资源的替代性,使得存活子女数对于老年人居住安排没有显著影响。

## 五、结论

现代化理论视角下,尽管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现状与西方理论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也有不少共性和对话空间。上海社会经济发达,受外来文化和现代化影响深刻,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更强,可以探索和深究的空间仍然很大。通过分析,我们发现。

第一,老年人现代化意识对其居住安排有着显著影响。低龄老年人现代化意识越高,与子女同住可能性越低,这从侧面表明上海市老年人群体的社会行为明显受到主观意愿的影响。现阶段,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大都市出现了大量城市空巢老年人,这不仅是因为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意愿在不断降低,而且也与老年人不愿意与子女同住有关。在现代化进程中,大都市老年人现代化意识越高,接受现代观念能力更强、速度更快,社会观念更加开放,并且表现在社会行动层面,改变了原有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本文研究表明,现代化与家庭结构变迁和代际关系变迁的关系,在上海市这类大都市之中与现代化理论视角下的工业社会存在较多一致性,尽管中国现代化的传统家庭观念变迁具有其自身的特色。

第二,上海市低龄老年人居住安排不仅受到其现代化意识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研究发现,老年人与子女的关系、老人自身的经济条件和住房条件都会制约其居住安排。一方面,现代化意识越强和自身经济能力越好的老年人,与子女不同住的可能性也越大;但另一方面,拥有更好家庭住房条件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可能性更高。这表明上海市老年人居住安排不仅受到现代化意识,即自身主观意愿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现代化意识低和自身经济能力相对较差的老人,更多受到子女庇护或是对子女依赖程度比较高,因此,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同住,住房条件可以得到改善。

第三,老年人健康状况对其居住安排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点与以往研究存在明显差异,当然,可能与本文研究对象为低龄老年人有关,该群体总体身体健康状况较好,且差异不大。此外,前文已经指出,由于以往研究多采用全国性数据,容易忽视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差异性。在受现代化影响比较大的大都市,老年人的社会行为与传统社会规范存在差异,他们更加注重生活的自我感受,代际观念相对淡薄,社会行为受主观意愿支配更强。加之,其子代由于各种原因与父辈同住意愿可能并不强烈,因此,他们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更低,即使健康状况差一些,但由于大都市生活便利以及医疗设施完善,仍选择不与子女同住。

随着我国大都市中准老年群体的日益壮大,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现代化意识更高的老年群体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低,这会导致家庭养老功能被进一步削弱,给社会养老带来更大的压力。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和养老问题日益严重背景下,如何有效解决老年人尤其是大城市老年人养老需求和培育与养老相关产业,将是我国社会不得不面临的难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将不断降低,这不仅将给我国传统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带来巨大的变化,而且也是转型中国的表征之一。

## 参考文献:

- [1] 刘欢:《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下的老年人口居住安排——基于家庭代际支持视角的研究》,载《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 [2] 章英华、于若蓉:《家庭结构的持续与变迁——海峡两岸老年人居住安排的比较》,载《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 [3] 夏传玲:《老年人日常照料的角色介入模型》,载《社会》2007年第3期。



- [4] Logan J R and Bian F and Bian Y.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Urban Chinese Family: The Cas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Social Forces*, 1998, 76(3): 851-882.
- [5] 郭志刚:《中国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载《人口研究》2002年第1期。
- [6] 鄢盛明、陈皆明、杨善华:《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 [7] 孙鹃娟:《中国老年人的居住方式现状与变动特点——基于“六普”和“五普”数据的分析》,载《人口研究》2013年第6期。
- [8] 曾毅、王正联:《中国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载《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5期。
- [9] 风笑天:《城市独生子女与父母的居住关系》,载《学海》2009年第5期。
- [10] 张翼:《中国老年人口的家庭居住、健康与照料安排——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 [11] 任强、唐启明:《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与情感健康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4期。
- [12] 阎志强:《广东老年家庭户增长、构成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载《南方人口》2016年第5期。
- [13] 靳永爱、周峰、翟振武:《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社区环境的调节作用》,载《人口学刊》2017年第3期。
- [14] 张莉:《对我国高龄老人居住方式影响因素的分析》,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 [15] 胡湛、彭希哲:《中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趋势分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考察》,载《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
- [16] 王建平、叶锦涛:《大都市老漂族生存和社会适应现状初探——一项来自上海的实证研究》,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 [17] 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载《人口研究》2013年第2期。
- [18] 许琪:《子女需求对城市家庭居住方式的影响》,载《社会》2013年第3期。
- [19] 曲嘉瑶、伍小兰:《中国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与居住意愿》,载《老龄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
- [20] 唐天源、余佳:《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状况分析——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载《南方人口》2016年第4期。
- [21] 阿历克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22] Bales R F and Parsons T.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6.
- [23] 齐美尔:《现代性诊断》,成伯清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24] Small A W. "The Function of Socialization in Social Evol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17, (2): 253.
- [25] Martin L G. "Living Arrangements of the Elderly in Fiji, Korea,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Demography*, 1989, 26(4): 627-643.
- [26] Couture P D. "Book Review: Christiani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Family", *Interpretation-Journal of Bible and Theology*, 2001, 55(2): 194-196.
- [27] Deng, T and He, X and Wang, J. "The Impact of Living Arrangements on the Elderly Welfare from a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 Relationship: Evidence from Chinese Elderly Dietary Quality",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16: 39- 48.
- [28] Goldscheider F and Bernhardt E and Lappegard T. "The Gender Revolution: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hanging Family and Demographic Behavior",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Review*, 2015, 41(2): 207- 239.
- [29] 谢桂华:《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载《社会》2009年第5期。
- [30] 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 [31] 唐灿、陈午晴:《中国城市家庭的亲属关系——基于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载《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 [32] 王树新:《论城市中青年人与老年人分而不离的供养关系》,载《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3期。
- [33] 陈皆明、陈奇:《代际社会经济地位与同住安排——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1期。
- [34] 石智雷:《多子未必多福——生育决策、家庭养老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载《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5期。
- [35] 肖云、温华凤、邓睿:《高龄失能老人居住方式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载《南方人口》2016年第3期。
- [36] 宁雯雯:《居家老年人养老自给能力与居住安排研究》,载《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5期。
- [37] 张立龙:《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载《老龄科学研究》2015年第2期。
- [38] 张淑芳:《城乡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健康差异研究——基于CHARLS2013年基线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载《老龄科学研究》2016年第5期。
- [39] 王萍、李树茁:《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载《人口研究》2011年第1期。
- [40] 穆滢潭、原新:《居住安排对居家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文化情境与年龄的调解效应》,载《南方人口》2016年第1期。
- [41] 吴晓刚、孙秀林:《城市调查基础数据库助力社会治理》,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第6期。

## Characteristics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Living Arrangements of the Younger Elderly in Chinese Metropolis

WANG Jian-ping, YE Jin-tao,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ety and population aging,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remarkable change in the structure of households in past several decades, characterized by a rapid decline in the average household size and in the proportion of extended households. Family remains the significance in elderly care in China. The choice of a living arrangement has many implications for the well-being of an elderly perso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of younger elderly people who aged 60–70 in metropolis Shanghai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aging, as well as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Data from SUNs shows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young elderly live together with their spouses (65.04%), and the proportion of living with their children is low (34.96%), which is much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Empirical results also reveal that the consciousness of modernization, personal financial status, and housing conditions all have their part to play in this process to determine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of younger elderly people, that is, older people with higher modernity and better pers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prefer not to live with children, but older people with better housing conditions are more inclined to live with children. The analysis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effect of healthy status and number of surviving children on younger elderly people's living arrangement is not significant.

**Key words:** metropolis; living arrangement; consciousness of modernization; younger elderly people

责任编辑 吴兰丽

(上接第 27 页)

- [39] 王洪亮、朱星姝、陈英哲:《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动态分解——基于中国老年群体的实证研究》,载《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8 年第 6 期。
- [40] 黄博函、徐龙顺:《发展中的社会保障信息化:一个研究综述》,载《社会保障研究》2019 年第 3 期。
- [41] 向运华、王晓慧:《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研究》,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
- [42] 王晓慧、向运华:《人工智能时代老年智慧照护服务体系探究》,载《学习与实践》2019 年第 5 期。
- [43] 姚虹、向运华:《健康状况、空巢原因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以恩施市农村空巢老人为例》,载《社会保障研究》2018 年第 1 期。

##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and Reflection on Elderly Health in China: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CNKI

XIANG Yun-hua, WANG Xiao-hu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Healthy aging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in the era of healthy China and aging. Over the past 20 years, domestic scholars have taken more and more research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is paper chooses 785 articles from CNKI about elderly health research and draws a knowledge map of elderly health research by CiteSpa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topics in the field of elderly health have been expanding and the research contents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elderly health, women's elderly health and health education are studied by scholars.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is lack of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system. Futur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lderly health should be taken to deeply excavate and analyze the specific social problems related to elderly health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elderly health, the impact of elderly health on labor force, the impact of elderly health on individual economic behavior and welfare,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service market and so on.

**Key words:** elderly health; aging; bibliometrics

责任编辑 吴兰丽